

鲍尔斯 回忆录

[美]切斯特·鲍尔斯著



鲍尔斯回忆录

奥兰多·鲍尔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ester Bowles

**Promises to Keep
My Years in Public Life**

1941—1969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71

根据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71 年版节译

鲍 尔 斯 回 忆 录

(原书名:《恪守诺言:

我任公职的年代(1941—1969年)》)

〔美〕切斯特·鲍尔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字数 244,000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1171·78 定价: 0.99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原名《恪守诺言：我任公职的年代（1941—1969年）》。作者切斯特·鲍尔斯（1901— ），美国外交官，民主党人，曾任副国务卿、总统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兼顾问，并两度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69年辞职退休。他的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没有恐惧的明天》（1946年）、《和平的新内容》（1955年）、《非洲对美洲的挑战》（1956年）、《革命世界中的美国政治》（1956年）等。

鲍尔斯是美国政界中所谓“自由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担任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肯尼迪上台后，任命他为副国务卿。在本书的前半部，鲍尔斯叙述了肯尼迪政府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例如：密谋策划对古巴的入侵，以及入侵失败后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和争吵；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干涉和侵略；支持冲伯集团，镇压刚果（利）人民的革命运动，等等。在这过程中，作者表示强烈反对入侵古巴，反对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干涉，不同意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吴庭艳、老挝右派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上，他主张撤换“冷战”时期推行“强硬路线”的旧班子。他详细地叙述了同政府中掌握实权的某些人在以上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并进行自我吹嘘。据作者称，由于这些

FG75/05

矛盾和分歧，他不久便被解除副国务卿的职务，调任挂名的总统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兼顾问，以后又调离这个职位，到印度去当大使。

鲍尔斯在书中所谈到的他同美国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的分歧，仅仅是反革命手法的不同而已。他的供述，不过是“**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那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人民日益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鲍尔斯深知美国如果继续采取军事干涉和露骨的侵略行动，必将引起这些地区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因此，他主张以经济“援助”、政治和文化渗透代替“军事解决”，以达到控制、奴役亚非拉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目的。

在对华政策上，鲍尔斯鼓吹以“一中一台”为基础，同我国改善关系。同时，他主张联合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遏制我国的革命影响。但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对外关系日益发展，国际威望越来越高。美帝国主义长期执行的孤立、敌视中国的政策已经遭到彻底破产。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纪录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鲍尔斯在本书的后半部叙述了六十年代美国同印度的关系。作者认为，印度政府曾屡次向美国寻求援助，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均执行援助巴基斯坦的政策，拒绝给予印度军事援助，并多次冷落印度政府的领导人，这样便导致印度逐渐离开美国而倒向苏修一边，使美国“失去了”在印度的“机会”。至于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

作者虽吹嘘印度取得了什么“进步”，但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印度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人民贫困。本书在提到中印关系和印巴关系时，有不少颠倒事实、歪曲历史的地方，如关于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作者竟诬蔑中国首先向印度“进攻”，充分暴露了作者的帝国主义立场。

本书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对了解和研究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外政策、内部争吵以及六十年代的美印关系均有参考价值。这里我们节译的是鲍尔斯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直至退休为止的部分。在这部分中，我们还删去了一些空泛的议论，无意义的引文和脚注。

本书由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及其协作单位的编译组译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四年一月

目 录

一、一个新政府	1
二、腊斯克和鲍尔斯的班子	20
三、大使馆和大使	41
四、猪 湾	55
五、老挝危机	66
六、说出我们的分歧	77
七、矛盾表面化了	91
八、矛盾激化	101
九、开始扮演新角色	111
十、对外经济援助	125
十一、对中国的新看法	140
十二、越南：灾难的造成	156
十三、非洲的挑战：刚果危机	174
十四、从华盛顿到新德里	191
十五、约翰·肯尼迪	209

十六、美国驻印度的使团 · · · · ·	225
十七、失去的机会 · · · · ·	242
十八、对尼赫鲁的印象 · · · · ·	262
十九、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 · · · · ·	276
二十、尼赫鲁的女儿当政 · · · · ·	289
二十一、林登·约翰逊和美国小麦 · · · · ·	309
二十二、中国、俄国和印度 · · · · ·	328
二十三、印度的前景 · · · · ·	341
二十四、别了，印度和亚洲 · · · · ·	375

一、一个新政府

一九六〇年二月，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参议院办公大楼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已经同意做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并说我们将在总统竞选运动中紧密地在一起工作。这件事使我的许多朋友感到惊讶。

导致这一宣布的事件酝酿了四个月。十月间，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西奥多·索伦森到Q街家里来看我。我们对于一般政治形势以及竞选运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几天之后，特德^①又来看我，说肯尼迪渴望我做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他示意说，我接受这个任务不但肯尼迪会感激，而且如果肯尼迪能赢得提名并当选为总统，也可使我个人得到一个好职位。

其后第二个星期，我会见了参议员肯尼迪。在讨论了政治前景和他的候选问题之后，他问我对于由索伦森转告的那个建议有什么想法。我告诉肯尼迪我很高兴，也有兴趣，但由于我和艾德莱·史蒂文森有长期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知道艾德莱的计划之前，我还不能同意。他说他能理解，并提出在我把这件事同史蒂文森讨论之后，

① 特德是西奥多的昵称。——译者

再和他谈一次。

第二天，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把肯尼迪的提议告诉了史蒂文森，强调我对他的许诺在先，我要他坦率地把他自己的政治计划告诉我。他回答说，他没有谋求被提名的意图。事实上，他正打算在仲冬时节到拉丁美洲去作一次长时间的访问。

我问他在四月间回来的时候，如果他对于参议员肯尼迪的国内外政策主张感到满意，是否同意支持肯尼迪，而如果他不满意，他会不会反对肯尼迪，或宣布自己参加竞选。我提出在他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之前，我不能对他有什么许诺。艾德莱说，虽然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支持，但是对于我所提的问题却不作答复，要我无论如何不要觉得对他有什么义务。

我个人选择的第二个总统候选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我曾和他在国会里密切地一起工作过，是我的老朋友。虽然我很钦佩和喜欢汉弗莱，但我不相信他在同肯尼迪、史蒂文森的竞争中能赢得提名。

我深信一九六〇年的总统选举可能是一次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治突破。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我们的国家停滞不前。他的保守政府容忍国内的高度失业现象。它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冷战的考虑和那种认为和平与稳定秩序只有通过军事力量的平衡才能维持的传统设想所形成的。

在自由派中间，只有那些最天真的人才会设想，通过几个条约和一些善良的意愿，世界的和平与友好就能获得。回溯人类历史的开始，关于战争和暴力的可怕记载

反映了文明的脆弱性和在表层下面的潜在的野蛮。有效的均势同延长战争之间的间歇几无差别（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从滑铁卢之战到马恩之战，持续了九十九年）。这样的均势迟早会被软弱的领导、愚昧的外交、某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假定优势，或者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国皇太子在萨拉热窝被刺那样的偶然事故的火星所粉碎。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如果人类的存在与毁灭之间全靠均势决定的话，那我对人类的前途就没有多大把握了。

我认为唯一现实的途径，是维持军事的均势来尽量争取时间，但是对于均势的脆弱性不抱幻想。我们只能希望，在这个时期内维护和平的必要机构能设法在加强了联合国里面建立起来，而联合国将最终成为世界秩序体系的基础。

我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写的那本《未来的政治突破》一书里，着重指出一九六〇年的总统选举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象早年我在一九五六年戈德金讲座所说的那样，我特别提到美国政治的周期性——已经基本上达成目的的一度伟大的政治运动逐渐消失了，而在关键时刻在新的领导下迸发出新的力量和承诺，又产生新的运动把我们推向前进。

虽然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避免了萧条，我们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在国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沸腾着争取美好生活的革命激情和要求，它们的领袖借用了我们独立战争所用过的词令，而我们自己看来已把这些原则忘却了。

历史学家托因比曾经说过，比原子弹更有力量的是

下面这个事实：世界上最偏僻乡村里的人将会认识到，贫穷、疾病、营养不良和不健康并不是无可避免的上帝的所作所为，而是可以改变的状况。可是我们却继续支持蒋介石、吴庭艳、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之流。

一个美国新总统，作为我所憧憬的全世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将遭到许多力图维持现状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站在他一边的，却是要争取我们独立战争时所宣布的自由的一切人类力量。这种力量一直在逐渐发展着，现在正激励着全世界每个角落的年轻领袖们。

虽然杰克^①·肯尼迪多半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没有别的可能当选总统的人象他那样具备使自由主义获得新生与奔头所必须的领导才能。肯尼迪年轻，有吸引力，是一个有勇气和声望的演说家。很清楚，他还没有从我深信是时代要求于我们的革命变革来思考问题，当然，也可以对他的伟大先驱者政治经历的类似阶段提出相同的指责。在南北战争的前夕，林肯曾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声称他没有释放奴隶的权利。一九三二年，在一千六百万人失业的时候，罗斯福曾经答应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平衡国家的预算。可是当这些人在历史危急时刻面对着总统应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完成了伟大的业绩。肯尼迪不也可能站起来面对目前的挑战么？

肯尼迪对我所写《未来的政治突破》的公开评论里面

① 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的那些话，加强了我认为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大致相同的这个信念。他说：“切斯特·鲍尔斯作出了又一重要贡献。他在这本书里为所有美国人指出了一个将恢复我们国内外政策之间平衡的创造性行动的议事日程。这本书并非是要我们怀旧，或只是谈些无稽的希望。他毋宁是具体指出了今后十年中我们国家的任务的性质。我们的国家有一大堆问题——国外的、国内的和军事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立刻应付。地毯必须立即揭开，清出来的那些问题必须抓住。切斯特·鲍尔斯使所有美国人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政治的未来希望。”

十月末，我告诉肯尼迪我愿做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我的一个条件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作为代表去参加同史蒂文森或汉弗莱的政治对抗。如果我能自由地起桥梁作用，帮助解决这三个人之间可能发展的将加深令人担心的党内倾轧的分歧，那么我对他和对党更能有所帮助。对此肯尼迪表示同意。

当他和我从他在纽约卡莱尔旅馆的套间走到电梯旁边时，肯尼迪说，他对于我们即将在一起工作感到高兴。他还说，我不应该不觉察到我也有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他说，如果一旦弄清楚，他自己得不到提名的话，“我要你知道，我将支持那些最早支持我的人。”我把这话当作是有点政治上的拉拢，而不把它当作真心诚意的表示。

我们商定，我将立即宣布对他的支持，然后在一九六〇年初宣布我做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肯尼迪强调说，虽然他感激我的政治支持，而他最需要的却是我在外交方

面的经验。但是我知道,我对肯尼迪最为重要的,是我在公众心目中会把他同史蒂文森、汉弗莱和我等人的外交政策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能使不少原来抱有怀疑态度的自由派安下心来。民主党自由派中的著名人物如埃莉诺·罗斯福、沃尔特·鲁瑟、艾德莱·史蒂文森或门南·威廉斯等还没有站出来支持肯尼迪,加强了我的这个看法。

这一点在十一月五日的报纸上也得到了承认。那天,艾伦·奥姆斯特德在沃特伯里的《共和党人》上报道说:

在民主党全国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中,鲍尔斯成了明确地、公开地选定肯尼迪的第一个人。他的选择使肯尼迪第一次获得了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的公开支持,不然的话,这个派别会依附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来反对肯尼迪的。

据说,如果肯尼迪接近于获得提名,而民主党的自由派看到自己的候选人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正在消失,又没有把握和不愿轻易地另作抉择,这样,鲍尔斯就能向他的自由派同僚们证明,肯尼迪是非常接近于他们所要挑选的那种候选人的,因而也许会引起民主党自由派发生有利于肯尼迪的全国性分化,从而使肯尼迪得到提名。

二月初,肯尼迪要我担任这个职务的信以及我表示接受的信都在报上发表。肯尼迪的信里有下面一段话:

寻求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是一九六〇年总统竞选运动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你的见识和你清楚阐述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根本外交政策问题的能力,使我获有深刻印象。所以,如果你愿意担任我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我要求立即实现……

我的复信的要点是：

我很高兴地接受作为你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

正如你所说的，寻求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是一九六〇年总统竞选运动的根本问题。我们国内所希望的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实现一个更和平的世界的能力。

需要一个崭新的、坚定的美国领导人，赋予我们的政策以方向、形式和调子。我将尽力从各方面帮助你，以促进我们的共同的外交政策观点。

在公开宣布了我的新职务以后的几个月里，肯尼迪和我经常每星期共进午餐一次，我继续感到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是大体相似的。我们都同意国务院迫切需要新的精神、较大的灵活性和更紧密的组织。我感到我们的经济援助计划不恰当，我们的军事援助显然被滥用，我们对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的立场不灵活，肯尼迪对我的这些关切似乎也有同感。我被要求阅读肯尼迪的大部分演讲稿并提出意见，可是这些稿子多半是特德·索伦森和肯尼迪自己写的。肯尼迪也仔细阅读我写的关于有争论问题的演讲稿，并经常提出意见。

一九六〇年二月，当我在周末到埃塞克斯去的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保罗·巴特勒突然来看我。巴特勒说，他刚才会见了党内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一致同意要我担任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的主席。我告诉他，我和杰克·肯尼迪的关系使我对于应否接受这个职务感到疑虑。我说，这会招致许多人的批评，包括反对肯尼迪的人在内，特别是林登·约翰逊和斯图尔特·薛明顿。保罗回答说，民主党领导人已经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断定这

件事决没有什么责任。

我打算去见肯尼迪，但他正在加勒比海度一个短短的假期。于是我就去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他极力劝我接受政纲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并且向我保证，杰克是会同意的。我在他的鼓励下同意了。

下一个星期左右，我用大部分时间来阅读两党过去的政纲，并把这些政纲同它们执政以后的记录作了比较。这不是一次令人安心的温习。使我特别触动的是那种含糊糊的语言，显然是故意要把目标弄糊涂，而不是把目标弄清楚。我觉得改变这个格局的一个方法，就是增加实际参加准备政纲工作的人数。如果有更多的人对党的主张负有某种个人责任，这个政纲可能再次成为关于原则和目标的严肃声明，而这正是政纲本来的意图。

因此，我建议在全国各地举行地方、州和区的预备会来听取意见，使每个关心的公民有机会讲他的心里话。除了这些听取意见的预备会之外，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还要举行整整一星期的听取意见的全国电视大会，让来自各个方面的全国领导人，从学校教师到家禽饲养者，都表示意见和提出建议。

到四月的第一周，区的听取意见会开起来了，因为这在美國政治中是独特的，所以引起报刊和电视的很大注意。代表着广泛不同观点的当地个人和团体，向派来主持这些会议的著名政治领袖陈述他们的意见。每次会议的进程都记录下来送给我。

按照过去的传统，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近年来更重要的电视观众，总是听些关于过去

成就和未来希望的单调的陈述，这些东西大都从人们的一只耳朵进去，另一只耳朵出来，也许失掉的支持要比得到的更多。

我说服全国委员会，我们的政纲核心内容应该比较简短，不到半小时就能读完。此外，他们同意先准备一部从一九三二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以来有关民主党成就的纪录影片，刚巧在提出政纲之前，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电视观众放映。

一九六〇年的四月和五月，我在同事托马斯·休斯、艾布拉姆·蔡斯、小詹姆斯·汤姆森和戴维·金斯伯格的协助下，准备了一份政纲草稿，不但反映我们自己的意见，也反映了那些参加我们的地方和区意见听取会的很多公民们的意见。

当我在五月中把这份草稿给肯尼迪看的时候，他只草草地瞟了一眼。^①我也让肯尼迪的姻兄弟萨金特·施赖弗看了这份草稿，近几个月来我已经和他很熟，而这次他恰巧和我们坐同一架飞机去参加代表大会。在我的坚持下，鲍勃^②·肯尼迪在把政纲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前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才比较仔细地把草稿定稿看了一遍，但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党内和全国都接受我的立场和观点，并且因为我是政纲委员会的主席，在他们看来那就行了。

政纲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进行得很顺利。事实上，赞成要有一个大力维护公民权利的纲领的意见占如此压

① 我怀疑他直到被提名以后才仔细地阅读它。

② 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